

# 军事伦理学国内外研究现状

孙啸宇<sup>1</sup>, 郑昱婧<sup>2</sup>, 周旭<sup>3</sup>, 孔英<sup>4</sup>, 王兰英<sup>5\*</sup>

1. 大连医科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大连 116044

2. 大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大连 116044

3. 大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大连 116044

4. 大连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大连 116044

5. 大连医科大学学生处, 大连 116044

**摘要** 分析了国内外军事伦理学的理论发展、军事技术伦理、军事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和军人伦理等4方面内容。通过总结与分析,发现军事技术伦理及军事实践中的伦理问题的研究将会持续发展。未来军事伦理学将以国际的视角,以军事实践活动的具体需要为依托,建立符合多元文化需求的军事伦理道德规范,以适应全球化共同利益的诉求。

**关键词** 军事伦理;军事医学伦理;军事技术伦理;伦理学发展;人体增强技术

刘淑萍在《现代军事伦理学概论》<sup>[1]</sup>中指出,军事伦理学“就是从总体上和联系上考察军事道德现象,并以一般伦理学原理为指导说明军事道德的本质、功能和各方面规律的理论科学”。军事伦理学是伦理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分支,并不是伴随战争而来的,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需要这样一门学科指导和规范战争行为以及军事行为,因此军事伦理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得到了世界的关注。

军事伦理学的产生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中

国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在经典的兵家典籍中体现了伦理学在军事中的独特地位。相比于中国古代军事伦理思想理论的浩如烟海,国外对于军事伦理思想的相关理论著作起步较晚,但是仍然在一些战争史中体现了意志对于战争胜负的关键性作用,表达了朴素的军事伦理观点。到了近现代,国外对于军事伦理学的研究愈加重视,而中国则略显落后,中国的军事伦理学观点主要体现在卓越军事家的思想论著中,其中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关于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以及“人民战争

收稿日期:2022-04-15;修回日期:2022-08-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4YJA8801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18JDSZ3050);辽宁省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22-166-914);大连医科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DYZD21004)

作者简介:孙啸宇,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医学伦理、心理学,电子信箱:2578816057@qq.com;王兰英(通信作者),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医学伦理、国防教育,电子信箱:709998691@qq.com

引用格式:孙啸宇,郑昱婧,周旭,等.军事伦理学国内外研究现状[J].科技导报,2022,40(18):79-86;doi:10.3981/j.issn.1000-7857.2022.18.010

理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等观点都是对于军事伦理学的时代体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战争形态不断演化。未来的战争形态可能会从“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变成“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这就引发了很大的伦理问题,从安全发展的角度警醒我们,需要将军事有关问题放在伦理学的框架下进行审视,这就使得军事伦理的研究成为迫切的课题。

## 1 国外军事伦理学的发展现状

国外军事伦理学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发展,基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期的几场区域性战争中出现的道德冲突与伦理困境等问题,很多军事家、政治家、伦理学家对专属于军事领域的伦理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且在重要的会议、期刊上发表了见解。《日内瓦公约》《纽伦堡法典》《生化武器宣言》《武装冲突法》等国际公约和法条也不约而同地体现了军事伦理思想的道德诉求。

### 1.1 基于理论发展的军事伦理思想

#### 1.1.1 关于战争问题的军事伦理学观点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发现有必要为自己提供足够强大的、足以对其他国家造成大规模破坏的军事力量,这就使得战争的破坏性朝向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关于战争道义性的伦理学研究是有效控制战争的理论依据,也是军事伦理学界的关注点。国外很多研究人员通过对近现代战争进行伦理学的审视与研究,从道义论的视角发起了关于正义战争学说的讨论。James<sup>[9]</sup>提出“正义战争理论的目的是试图通过一系列标准来保证战争在道德上是正当的,所有这些标准都必须满足,战争才被认为是正义的。标准分为2类:‘诉诸战争的权利’和‘战争中的正确行为’。第一个是参战的道德,第二个是战争中的道德行为。”战争的道义论是建立在伦理学“功利主义”基础上的战争伦理思想研究,辨析了关于战争前和战争中的“应然”与“实然”的关系,以最激烈的手段完成最大的“善”才是战争道义论的核心体现。作为对战争进行伦理反思的传统代表,正义战争理论仍然是战争伦理学领域中处于领

先地位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

#### 1.1.2 对军事伦理学发展的探讨

2021年,Stanar<sup>[3]</sup>提出“在战争史上从未有过军事伦理如此重要,仅仅是因为历史上的战争和战争中的杀戮从未如现在这样的容易”。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新武器的使用,杀戮已经成为一种“物化”的行为,士兵只需操作按钮就可以实现远距离、超视距、大规模的杀伤,对士兵而言这种杀伤只是屏幕上数据的变化。这就使得战争和大规模冲突成为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效和无情的杀手。可见,从人类生存发展的角度看军事行为迫切需要军事伦理学予以监督和审视。Fotion等<sup>[4]</sup>提出:“军事伦理必须是和平时期的伦理,也必须是战争的伦理;必须是战地士兵的伦理,也必须是政治领导人的伦理”。军事伦理学理论经历了较长时期发展,国外对于军事伦理基本的理论构建、研究对象、体系结构已经有了较为成熟成果。从军事伦理学研究内容的广泛性看,研究人员也在不断完善和补充关于军事伦理学科研究所涵盖的内容。从最初针对战争中具体伦理问题“正当”与“应当”的辩论,逐渐转变为对军事伦理学研究范围的扩展、研究价值的不断提升,甚至军事伦理中的“道德主体”和“道德客体”也在发生变化。当前国际上很多研究人员除了对军事伦理思想本身的研究,也在关心如何实现军事伦理学的教育与普及问题,让不同层次的人了解、关注、执行军事伦理的规范和原则,也认识到军事伦理不仅是国家、军队、政府、官员的事,也涉及士兵、公民的个人权益。

### 1.2 基于科技发展的军事技术伦理

#### 1.2.1 人工智能在武器中的应用所带来的伦理学问题

虽然人工智能诞生的目的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但也无法避免其应用到军事作战中。因而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变革性的,也可能是颠覆性的。人类历史上无人机的首次应用是在2002年阿富汗反恐作战任务中,美军由此看到了无人机战术机动性强、生产维护成本低及作战效费比高等优势<sup>[5]</sup>。Wasilow等<sup>[6]</sup>则根据当前军用人工智能的发展状况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多项可能

面临的问题挑战,如正义战争理论的威胁、智能武器的安全问题、责任的归属问题等。Thibault<sup>[7]</sup>也看到了军用人工智能存在的风险,指出机器的自由空间越大,它就越需要道德标准的制约。因此提出效用函数的理论,通过效用函数计算各种决策方案带来的结果分数,并找到以伦理道德原则为基础的最优选项。2020年兰德公司发布了《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不确定世界的伦理问题》报告,强调国际竞争将激励各国在没有足够重视安全性、可靠性和人道主义后果的情况下,仓促发展军事人工智能,这将导致一场“逐底竞争”,最终威胁到人类对军事人工智能系统行使代理权的能力。

### 1.2.2 人体增强技术在军事中的使用所带来的伦理学问题

在美国,生物增强技术同样是军事伦理学中的敏感话题,如果一种药物能改善认知缺陷患者的认知功能,其程度超过了认知功能的普遍标准,那么这种药物显然就有资格成为一种增强药物。梅尔曼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探讨,他提出了生物增强药物可能引发的各类伦理问题。并建议将比例原则、家长主义原则和公平原则作为生物医学伦理应用的参照规范。Arthur等<sup>[8]</sup>在2020年发表的文章中探讨了安非他命、生物增强技术在士兵中的使用所带来的军事伦理问题。他认为这种生物增强的药物或者技术已经是生物武器的体现,除了对士兵个人造成的伤害及相应的致畸等副作用,也会对人类的生存发展造成较大的损害。除此之外,还有类似于外骨骼或者是单兵数字化装备的生物增强技术。从各国强化战斗力提升的角度看,有必要加以应用,但是从士兵使用者的知情同意以及由此带来的副作用看,人体增强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还需要强化伦理监管机制。

## 1.3 基于军事实践的具体伦理问题

### 1.3.1 军事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与探索

军医这一职业包含着双重身份,即军人与医生。作为一名医生,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坚持以患者为中心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sup>[9]</sup>;作为一名军人,忠诚使命、保家卫国,服从于国家和军队所需是其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然而当个体同时承担两种职业

道德,则会产生责任冲突。人类对于军医的责任冲突的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Dennis和Howe代表的美国研究人员开始意识到军医的职业道德与普通医生之间的差异<sup>[10]</sup>。

Richard等<sup>[11]</sup>将2017年由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军队卫生系统医学伦理原则(MHS原则)与美国医学协会(AMA)的医学伦理原则对照,详细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通过对各项条目的差异分析,能够看到MHS原则意在军医不仅要遵守传统的医德,还要把军事任务的利益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然而,在现实的作战环境中,对相关原则的履行会变得并不容易,患者群体可能是友军、敌方人员或平民的任何组合,他们可能受到也可能没有受到军事行动的影响。资源分配不足、战地类选法的要求、治疗设施使用资格的医疗规则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与解决。特拉维夫大学的奥伦·阿斯曼于2017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到:向一部分伤员或病人提供高级的护理,而其他伤员或病人甚至得不到最低标准的护理是不人道的,并建议为不同类型的人们建立不同的医疗保障,前提是每个人都至少得到基本水平的保障。

### 1.3.2 对于军人道德创伤的关注与发展

在一项关于美国有自杀风险的退役军人主要情感成分的调查中,近80%的老兵回答是感到绝望、感到生活没有意义<sup>[12]</sup>。道德创伤是自我道德矩阵的倾斜或颠覆,是战争中反道德行为对个人道德良知造成的创伤<sup>[13]</sup>。近年来,西方军事伦理学界逐渐意识到道德创伤并不等同于普通的心理创伤或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Williamson等<sup>[14]</sup>通过对英国退伍士兵在军事行动中所遭受的创伤的定性分析,发现相对于非道德性创伤,道德创伤会对个体的认知和情绪产生不同的影响,并指出与道德创伤相关的精神疾病患者可能需要不同的治疗方法。Jamieson等<sup>[15]</sup>指出,临床医生如果不了解道德创伤、不清楚道德创伤发生的情景,其选择的治疗方法可能会对治疗效果产生阻碍,例如对有战场道德创伤的患者进行暴露疗法,不仅不能促进其康复,反而会导致患者病情恶化。对于如何科学、系统地治疗道德创伤,仍需进一步探索。

## 1.4 基于职业属性的军人伦理问题

### 1.4.1 军人的角色意识与伦理选择

当前西方仍然存在“军官与绅士”的谈论,军人所面临的道德伦理问题在于其职业本身。近年来,西方研究人员对于军人伦理学的探讨与研究不断深入。通过对某些现实案例的分析或以不同的视角,分别阐述了军人在军事行动中、非军事行动中所面临的责任挑战,就军人应当遵守何种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提出建议。James<sup>[16]</sup>针对如何教育军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详细探讨,他强调士兵首先是一个好人,而后才可能是一个好士兵;认为军事人员必须能够思考美德的本质及其对行动的影响,在言行上认清出于正当军事需要而杀人和杀害无辜的本质区别。建议军校通过建立高标准的严肃课程,创造一种坚持合理和道德行为的氛围,并聘用和提拔有组织、有能力、有热情、公正的教师为军人灌输道德美德,当军人处于伦理困境时可以平衡好军人角色与伦理选择之间的关系。

### 1.4.2 军人伦理价值研究与探讨

Cutright<sup>[17]</sup>在国际哲学研究杂志中以“移情”这一概念为视角,挖掘军人在军事任务中面临的诸多伦理问题。“移情”一词最初起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指心理治疗过程中,患者对治疗师产生的强烈情感。而在该文中,军人“移情”的含义类似于共情,指个体理解他人想法和感受的能力。作者认为战士的同理心即是移情能力,能够加强自身的人性,尤其在反人性的复杂的作战环境中更加能够有所体现。但同时也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协调同理心,否则士兵将会在面对受伤的敌人、敌方非战斗人员、战友等艰难选择的情况下,被同理心混乱产生的痛苦所压倒。挪威科技大学哲学和宗教研究系 Cornelia<sup>[18]</sup>讲述了一个真实案例,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与圣战者团体谈判的过程中发现,在他们的会议上端茶倒水的小男孩存在诸多的心理、行为问题,经分析得出这个男孩可能遭到过多名男子的强奸。通过这个案例,引出了军人在非作战任务中所面临的道德冲突同样值得关注。认为士兵在处理国际事务的特殊环境中,应当成为更有能力的道德决策者。

## 2 国内军事伦理学的发展现状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军事伦理学逐渐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国内军事伦理学的研究经历了3个阶段,从军人伦理学研究的兴起,到军事伦理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再到军事伦理学的系统发展。近年来涌现出大量科学的、先进的军事伦理学研究论点。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军事伦理思想、军事技术伦理、军事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军人伦理4个方面。

### 2.1 基于理论发展的军事伦理思想

#### 2.1.1 关于战争问题的军事伦理学观点

战争是军事活动中最特殊、最激烈的一种形式,战争所带来的破坏性效果也是引发伦理学极大关注的动因,关于战争问题的伦理学研究是军事伦理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赵枫<sup>[19]</sup>对中国近代所产生的军事伦理思想的研究就是围绕战争本身展开。19世纪中叶,面对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清军与外国侵略者,太平天国通过仿制与使用西式武器等途径积极谋求提高军事技术水平,与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清军、外国侵略者顽强抗争。虽然其军事伦理思想存在明显的阶级局限性,但其先进的军事技术伦理思想推动了军事伦理思想中战争问题的发展与前进,值得学习与借鉴。作为一名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集百家于大成,在作战、治军等方面,不仅吸收了《孙子兵法》、儒家仁战等思想,同时也将马克思主义军事伦理思想融汇贯通,形成其特有的符合当时国情的关于战争的军事伦理思想。

#### 2.1.2 从历史角度进行军事伦理发展的探讨

国内关于军事伦理思想的研究比较倾向于追根溯源,中国的军事伦理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初见端倪。在此时期产生了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其对于战争问题的思考时至今日仍值得深入研究。商海燕<sup>[20]</sup>系统阐述了《孙子兵法》中所蕴含的军事伦理思想,包括战争伦理思想、作战伦理思想、治军伦理思想和将帅伦理思想。《孙子兵法》中的军事伦理思想虽具有历史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超越时代、具有历史进步性的特点。陈林<sup>[21]</sup>对思想家孔子在军事伦理思想上的成果进行

了分析。儒学思想在军事伦理中主要为2方面。一是战争目的正义性。正义是决定军事斗争合理性的本质要求,军队要成为一支正义之师、王者之师。二是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要以仁爱为先导。这一思想贯穿于近代中国建军以后,延续至今。

## 2.2 基于科技发展的军事技术伦理

### 2.2.1 人工智能在武器中的应用所带来的伦理学问题

相比于国外对于人工智能武器伦理学研究,国内对于人工智能在军事方面应用的伦理学研究开展的较少。无人化战争和无人机的使用等都是人工智能武器的重要体现。石海明<sup>[22]</sup>通过对美国无人化武器的发展情况分析,认为未来无人化战争将会存在“战争权利伦理”“战争行为伦理”“战争责任伦理”3个方面的困境。而若想改变这种困境必须形成强大的伦理学监管机制、强化制裁措施和促进国际合作3种方式进行社会化调试。陈多闻等<sup>[23]</sup>提到军事的生态伦理,倡议绿色武器的发展方向,同时提倡人道主义伦理共识的推进,建议将高新技术应用到非致命武器的研发。新华网针对无人化武器的滥用问题发表了评论,远离战场的虚拟环境会使作战人员大幅淡化对于战争的敬畏感,同时由于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无人化武器具有成本低、无接触、零伤亡等特点,在国际上已经演变成滥用的趋势。更让人们担心的是,一旦完全自主化的无人作战系统的智力超过人类,可能会出现人类被完全排斥在“作战链”之外而束手无策的危机。

### 2.2.2 人体增强技术在军事中应用的伦理学

人体增强技术是当前医学领域和军事领域关注的热点,也是未来影响作战效能的关键性技术。近年来中国研究人员针对这一领域中有关军事伦理的研究日益火热,究其原因是增强技术对人体进行直接干预的行为产生了较大的争议。王晓明等<sup>[24]</sup>系统阐述了美国人效能增强技术的成果及进展,以及可能引发的伦理学问题,重点关注技术所带来的伦理学风险。另一个新兴科技——聚合科技同样值得关注。所谓聚合科技,是由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及认知神经科学聚合而成的全

新概念<sup>[25]</sup>。这些技术在军事中的应用意在通过对代谢工程、外骨骼增强、生物医学检测系统等领域的探索,从各方面实现人体机能的增强。但正如莫雷诺所言:“人是战争史上最久远的主体,也是最脆弱的节点,提升人体机能的手段,不仅不会‘加固’这一节点,反而使其更加脆弱。当战争较量围绕人体展开的时候,这对整个人类都十分危险。针对高新科技的伦理问题,中国同样秉持着正义战争原则,同时将马克思军事伦理思想渗透其中。”

## 2.3 基于军事实践的具体伦理问题

### 2.3.1 军事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与探索

国内关于军事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军事医学伦理学这一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国内首次提出之后,到了21世纪才逐渐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李乃义<sup>[10]</sup>对造成军医责任冲突的现实原因进行了阐述。对大批等待救治的伤员,以我军的救治原则,本应遵照先重后轻、先急后缓的原则,但指挥者会基于战场的实际情况,为了让更多轻伤员尽快返回战场而要求按照先轻后重的原则。此外,军医基于医学知识可能没办法对没有救治意义的伤员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更倾向于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更多的轻伤员。军事医学伦理必须首先明确军队医务人员的行为底线。对于这类问题,常运立等<sup>[9]</sup>提出明确建议,认为军医在角色与职责转换时,必须将患者利益置于首位。

### 2.3.2 对于军人道德创伤的关注与发展

在国内,近年来关于军人道德创伤的研究同样是热点话题。杨放等<sup>[13]</sup>对有关道德创伤进行了大量研究,他将道德创伤与其他类型的心理疾病合理区分,提出道德创伤是既有人文社会属性的道德,又具有自然科学属性的复合概念。近年来,多位研究人员从不同的视角,以图为道德创伤的本质与治疗寻求方向。黄强等<sup>[26]</sup>通过对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进行深入分析,试图解释军人道德创伤的产生原因。王璐颖等<sup>[27]</sup>尝试通过儒学思想,融入道德创伤的治疗中。易黎等<sup>[28]</sup>则引入了“道德韧性”概念,并构建了道德韧性对于道德创伤的作用机制,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打开了全新视角。

## 2.4 基于职业属性的军人伦理问题

### 2.4.1 军人的角色意识与伦理选择

军人伦理学是军事伦理学理论的基础,最初的军事伦理学研究都是围绕军人伦理的内容开展的。很多研究人员试图通过不同时期的军事人物的伦理思想或者相关典籍中的军事伦理观点进一步探析军人除了职业需求以外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及其伦理约束。徐炳杰以儒家伦理整体主义、义务本位、理想人格、大一统思想为价值基础,模塑古代爱国军人的精神世界,主要表现在军人忠德、武德修养、武德人格、道德责任、气节意识、忧患意识等方面<sup>[29]</sup>,这些精神的体现为现代军人伦理行为和伦理选择提供了范式。林骊珠<sup>[30]</sup>分析了在战争中军人所要遭遇的战争暴力与人性的冲突、英雄与罪恶的矛盾挣扎,剖析了困境的根源在于正义性政治目的缺失、军人个体行为失范、军人伦理教育缺位等方面的原因,希望通过伦理学教育帮助士兵平衡好道德与角色的冲突。

### 2.4.2 军人伦理价值研究与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提振当代革命军人精气神,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2012年,谈际尊<sup>[31]</sup>从伦理学的角度探究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学理基础,他提出“军人要把握军事行动的文化内涵,理解战争行为的道德性质,强化职业担当的使命感”。当代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祖国、献身使命、崇尚荣誉5个方面。忠诚于党为“不变质”提供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热爱人民和报效祖国为“打得赢”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献身使命为战斗精神培育提供行之有效的基本准则;崇尚荣誉为官兵的全面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军人的核心价值观是军人伦理价值的重要内容。

## 3 未来展望

现实中出现的军事伦理问题,需要军事伦理学加以梳理、阐释,为军事活动提供伦理价值的辩护

及行动准则的设计与规范,军事伦理学因此愈益凸显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及实践需求<sup>[32]</sup>。与伦理学的其他内容相比,军事伦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是他的发展与其他学科一样遵循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再到实践的发展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大场合反复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是一个精神共同体、伦理共同体,是当代突破民族国家限制的人类最高伦理实体,也为军事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价值导向。当前,国际军事问题日趋复杂,需要面对的是全球化的共同利益诉求,牢固的军事伦理学理论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对于军事活动中的具体问题的伦理研究则越来越受到国际的广泛重视。军事技术伦理和军事实践的伦理问题将会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由于新军事革命带来的军事技术变革使战争形态一再突破认知的底线,前所未有地将人类的生存发展置于危险的境地,只有将军事技术的突破置于伦理学的框架中进行考量才能有效控制军事高科技所带来的对人类的潜在危害。出于世界各国核心利益的需要,面对传统疆域向新型疆域的转变,国际上不断推动维和行动地开展以及国际性反恐联合军事活动。要让这样一支来源复杂、文化迥异的国际力量发挥更好的作用,必将需要出台相应的国际军事伦理学规范给予约束,以及促进相互融合。关于军事伦理的研究不仅是基于道德框架的思辨与探讨,也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下构建具体的行动指南。目前军事伦理的观点散见于各种国际法规和合约中。在《武装冲突法》中对于战争目的的合理性进行了规范,也对战时交战双方的战争手段和作战方法做出必要的限制,这些都是军事伦理观点在其中的体现。另外,《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纽伦堡法典》等相关法规和公约也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国际人道主义原则和军事医学伦理学规范。随着新型军事领域的拓展,国际上以法律法规的方式对军事伦理问题进行界定与规范将是解决问题理想的发展方向。因此,军事伦理学的研究既要解决对内的国防、军事、军队、军人发展之需要,也要协调好国际事务中的各种复杂而现实的矛盾冲突。

对于国内军事伦理学的研究,既要有根植于中

国传统文化体系军事伦理学的主张和特点,同时要不断强化国际上的互联互通。既要看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体系、不同利益主体对于当今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军事伦理诉求与规范认同的矛盾冲突,也要看到全世界需要面对的来自于太空、深海、极地、能源、环境、粮食等方面共同危机中的伦理需求。在当今世界,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不能简单地诉诸武力,而是应该在一个大的军事伦理框架下的合作与共赢。因此军事伦理学的研究应该站在全球视野,放开眼界,批判借鉴外国关于军事伦理学的文化成就和经验,丰富和发展军事伦理学的理论成果转化,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绩。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刘淑萍, 赵枫. 现代军事伦理学概论[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5.
- [2] James B W. The just war doctrine in catholic Thought[M].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20.
- [3] Stanar D. The vital significance of military ethics[J]. Journal of Military Ethics, 2021, 20(3/4): 237-250.
- [4] Fotion N, Gerard E. Military ethics[M]. Oxfordshire: Taylor and Francis, 2020.
- [5] 张家茂, 石海明. 美军大型无人机装备发展概述(上)[J]. 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 2021(1): 16-21.
- [6] Wasilow S, Thorpe J B.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ics, ethics, and the military: A canadian perspective[J]. AI Magazine, 2019, 40(1): 37-48.
- [7] Thibault S, Boufous O, Escalle P.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s and human values: The cases of military drones and companion robots[J]. Artificial Life and Robotics, 2019, 24(3): 291-296.
- [8] Arthur S, Jaliya K. Amphetamines, cognitive enhancement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medical military ethics[J]. Journal of Military Ethics, 2020, 19(1): 69-75.
- [9] 常运立, 杨放. 军事精神医学伦理的关注视域——军事精神医学伦理研究之三[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4, 27(6): 783-786.
- [10] 李乃义. 军事行动中医疗行为伦理困境的思考[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9, 32(1): 71-74.
- [11] Richard T, Frederick L, Girton J, et al. A code of ethics for military medicine[J]. Military Medicine, 2020, 185(5/6): e527-e531.
- [12] Kopaczmarek S. Moral injury: A war trauma affecting current and former military personne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2014, 60(7): 722-723.
- [13] 杨放, 常运立. 道德创伤: 军事医学伦理新概念[J]. 医学与哲学(A), 2015, 36(11): 9-14.
- [14] Williamson V, Murphy D, Stevelink S A M, et al. The impact of trauma exposure and moral injury on UK military veterans: A qualitative study[J].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 2020, 11(1): 1-10.
- [15] Jamieson N, Maple M, Ratnarajah D, et al. Military moral injury: A concept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Nursing, 2020, 29(6): 1049-1066.
- [16] James H T. True faith and allegiance: The burden of military ethics[M].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4.
- [17] Cutright T. The empathetic soldi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19, 27(2): 265-285.
- [18] Cornelia V. Responsibility in complex conflicts: An afghan case[J]. Journal of Military Ethics, 2017, 16(3/4): 239-255.
- [19] 赵枫. 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初探[J]. 军事历史研究, 2014, 28(2): 117-125.
- [20] 商海燕. 《孙子兵法》军事伦理思想略论[J]. 孙子研究, 2020(1): 58-62.
- [21] 陈林. 以礼为固, 以仁为胜: 孔子军政关系理论探赜[J]. 武陵学刊, 2021, 46(4): 9-16.
- [22] 石海明. 无人化战争的伦理困境及社会调适[J]. 伦理学研究, 2014(4): 118-122.
- [23] 陈多闻, 何祖龄. 军事技术伦理价值的三重形态[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3(4): 21-27.
- [24] 王晓明, 李宁, 王新兴, 等. 美国人效能增强技术发展应用[J]. 科技导报, 2021, 39(7): 96-101.
- [25] 石海明, 曾华锋. 聚合科技的军事应用前景及其伦理困境[J]. 国防科技, 2015, 36(1): 85-89.
- [26] 黄强, 谭坤, 常运立. 从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谈道德创伤的发生与防治[J]. 医学与哲学, 2019, 40(23): 42-45.
- [27] 王璐颖, 常运立. 儒家文化视域下的道德创伤及治理[J]. 医学与哲学, 2019, 40(9): 35-39.
- [28] 易黎, 武润哲, 肖楚兰, 等. 道德韧性: 道德创伤中的承接要素[J]. 医学与哲学, 2019, 40(9): 32-34.
- [29] 徐炳杰. 试论儒家伦理对中国古代爱国军人的精神塑造[J]. 孙子研究, 2016(5): 34-43.
- [30] 林骊珠. 战争中的军人伦理困境及其超越——基于军校西方战争文学教学的反思[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 2018, 34(3): 123-126, 141.
- [31] 谈际尊. 军人核心价值观伦理学基础[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2.
- [32] 刘淑萍, 李磊. 当代军事伦理学发展的战略价值[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3(4): 72-77.

## Research status of military ethics at home and abroad

SUN Xiaoyu<sup>1</sup>, ZHENG Yujing<sup>2</sup>, ZHOU Xu<sup>3</sup>, KONG Ying<sup>4</sup>, WANG Lanying<sup>5\*</sup>

1. The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44, China
2. The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44, China
3. The College of Stomatology,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44, China
4.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44, China
5. Students' Affairs Office,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xtensive researches of military ethic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focusing on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e military technology ethics, the ethical issues in military practice and the military ethics. It is shown that the researches of the military technology ethics and the ethical issues in military practice will continue. In the future, the military ethics will focus on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specific needs of military practice will call for establishing military ethics and moral norms with the multiculturalism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military ethics; military medical ethics; military technology ethics; ethical development; human body enhancement technology ●



(责任编辑 傅雪)